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日常與對談

綠 茶

我的日常平凡而乏味，讀書、寫作、畫畫、買菜、做飯、接娃……大多數時候獨處，很少與人交集，久而久之，已經不太適應社交模式，每月只和「六根」幾位老友小聚，喝酒打牌閒聊。

但人是社交型物種，渴望人與人的互動。以前在職場，身邊有很多同事，人際交往是日常；如今，居家已十多年，漸漸適應長時間自處，偶爾外出社交，出門時略帶驚喜，交往後又心生倦怠，說那麼多言不由衷的話，有時候還會遭遇陌生人索加微信，感覺莫名不適。

回想疫情那幾年，倒是「I人」避難所。制度性的隔離，讓社交變成負擔，甚至是危險的，心安理得待在家裏，讀書、寫作、畫畫、做飯，以及一天又一天重複的日常。在這樣的情境下，人反而變得清醒，思考我們真正想要的社交是什麼樣的？

正是那段時期，我和藏書家韋力在微信中閒聊，我們商量着用「答問錄」的形式，探討古書收藏一二三，一問一答，涉及古書收藏方方面面，原計劃做「古書收藏三百問」，最終只進展到五十問，後來各自事務繁忙，計劃就此擱置。

儘管這一計劃「爛尾」了，但留下來的這五十問，還是一次難得的見證，為我們當時的苦悶心情提供了緩解的出口。比如，我問韋力兄：「做一名藏書家的幸福指數有多高？」

韋力答道：「我忘記哪位哲人說過一句話：收藏家是最幸福的，因為他總能從所獲中找到快樂。其實藏書家也有賣書之痛。清代藏書家方地山說：『買書一樂，有新獲也；賣書一樂，得錢可以濟急也；賣書不售一樂，書仍歸我所有也。』我覺得方先生的幸福指數就很高，買書有得書之樂，賣書有得錢之樂，賣不

出去仍然能為之一樂，因為書還在自己手中。這就是極佳的心態。」

當然，藏書並不見得都是快樂的、幸福的，煩惱和苦悶也伴隨而來。我接着問韋力兄：「藏書最大的煩惱是什麼？」他倒是很快地答道：「這個問題最好回答，缺錢是最大的煩惱。」

接着，他進一步解釋：「藏書是一個活錢變死錢的過程。即使你家裏有一座金山，但隨着你眼界的增高，那座金山也不夠花。資金來源有限，而愛書之情無窮，因此說，無論你有多少錢，只要你喜歡上了藏書，你絲毫不用擔心花不完。而最為弔詭的是，每當你把手中的錢花到彈盡糧絕時，你會發現更好的書在那裏向你搔首弄姿。面對美人徒喚奈何，這樣的心態當你誤入愛書圈時，你早晚能夠體驗到這其中的酸澀。與之相關聯的問題，前面已經提及，那就是隨着藏書的增多，你會發現家裏的地方越來越不夠用，而唯一辦法，你只能再拿出一筆錢來專門買一套房或添一座樓，而此時你的愛書病已病入膏肓，你不願意抽出一筆錢來買房。左右為難地糾結，只要你愛書，你終有一天會體會到。」

這些日常和對談，是我和韋力兄在那段特殊時期的有效撫慰。與此類似，我和另一位老友韓浩月，在那段時期用書信的方式往來，那一年多時間往來三十多通手寫書信，不久前我們把這批書信結集，出版為一本《村郊通信》，用文字真實的溫度，記錄了那段特殊時期的情緒與情誼。

過去兩年，我策劃出版了兩冊《書店日曆》，收錄了一百二十餘家中國民營書店，每家書店有一段我和店主或主理人的對談，從這些對談中，可以看到豐富多彩的書店生態。儘

管書店的生存比較艱難，但從他們的回答中，我們更多看到一股精神的力量，一種積極的心態，和對這個行業的執著與堅守。

比如，我問單向空間創始人許知遠，「做書店，特別是做民營書店很艱難，為什麼非要堅持開書店？」許知遠真誠地袒露，「書店不是一門賺錢的生意，但是是一種有效的表達。堅持開書店我想是因為『有話要說』。比如單向空間從創立到現在也近二十年了。從圓明園到藍色港灣、花家地，從北京到阿那亞、杭州、佛山和日本東京。我們開書店，不斷地做文化沙龍，後來又做出版，做文創，做《十三邀》，做播客，我們一直在用不同的『語言方式』作表達。」

表達是單向空間做書店的一種態度，而對於南京先鋒書店創始人錢小華來說，「書店正像一支小蠟燭點燃無數支蠟燭一樣，在群山之巔燃燒的光照亮許多的人，喚醒更多沉睡的靈魂，引領人走向光明的世界，或許可以說以某種方式照亮了我們時代的心靈。總要有人走在前面，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情懷，中國文化的根在鄉村，復興中國文化首先復甦鄉村；回歸鄉土就是回歸中國，鄉村才是我們最大的競爭利器。」

在我設計的關於書店的話題中，每位店主和主理人從自身書店出發，給出了只有親歷才能感同身受的答案，這些答案不是結果，而是開書店作為一種精神信仰，過程中的歷練與體會，是這個社會多樣化的樣本，更是開書店的幸福之源。

此外，本書還收錄了我和幾十位讀書人關於書房、關於文學、關於書籍傳播等方面的對談，這些都是愛書人關心

的話題，也是我一直想要探求的答案。而這些話題，日常的社交中很難獲得，唯有通過文字，通過對話，才能引發彼此袒露心聲。正如學者杜君立訪談中所言：「人過中年，知足就好，一切都慢了下來。對我來說，寫書和讀書一直是我的夢想，如今看來或許也是我的命運。我覺得生活在書的世界就足夠了，書的命運也是我的命運。」

這些散落在電腦不同夾子裏的文字，不僅僅是我一個的，更是朋友們的思想碎片。這些年，通過和他們一次次的對談，也是對我的一種啟發與警醒，每每有困惑時，翻出來重讀，總能感受到一股溫暖、一份安心。

作為書齋裏的「I人」，這樣的對談還會在我以後的文字生涯中繼續，尤其在AI時代，這種人與人的對話，自帶溫度和活人感。而人與AI的對話一天可以產生浩如煙海的文字，但那樣的文字洪流會把人淹沒，讓人失去方向，失去對文字的敬畏。

書房芷蘭齋。

作者繪

讓 座



HK人與事
朱昌文

腿意外受傷和關節退化，有點不良於行，為安全計，外出時需要持枴杖助行，因而在乘坐各類交通工具時，切實感受到今天香港市民對「弱勢社群」由衷的關愛，令讓座蔚然成風。

十餘年前起，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、港鐵、電車等都有「關愛座」（或稱「優先座」）之設，是為長者、孕婦、殘疾人士和行動不便者設立的座位，原意是推廣禮讓精神與無障礙環境。原則上，一般乘客亦可享受關愛座，惟遇上有需要人士時，相關乘客應主動讓出座位。然而，自關愛座面世後，就不斷引起爭議。一些年輕乘客佔坐了關愛座後，只顧低頭看手機，不理身邊站着的長者或手持枴杖的有需要人士，倘若有長者出言要求讓座，會反唇相譏或不加理會，照坐不動。

近年隨着政府和社會對弱勢社群的照顧日益重視，加上許多學校和團體舉辦各種活動，宣揚禮讓和關愛精神及各種助人美德，令讓座文化越來越被認同為文明社會應有之義。

過去幾個月來，當筆者拄着枴杖登上港鐵或公共巴士時，即使車廂擠滿人，總有坐

在座位上的乘客馬上站起身向我示意讓座，其中有些臉上還帶着微笑，令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連忙點頭道謝，心中湧上一股暖流。也許女性愛心較強，讓座給我的較多是女士。有時，我來不及細看周圍，手臂被人輕輕碰了一下，原來是一位女乘客示意讓座給我，我當即點頭帶笑道謝。這樣的情況，出現了好幾次，似乎成為「順理成章」的事。

讓座者不僅是本地居民，也有一些是外來遊客和外傭，大概他們都感受到香港的讓座風氣，因而也「入鄉隨俗」，自覺讓座給有需要的乘客。通常，當我坐下後，會對讓座者微笑點頭，表示「無言的感激」。

我觀察到，香港的讓座文化，有一種獨特的「港式體貼」。它不張揚，往往只是一個眼神交會，一個點頭，或是一個「你坐」的手勢，便安靜地完成交接，避免了受助者的尷尬。這看似簡單的舉動，背後是香港社會越來越濃厚的禮讓和關愛風氣，也由於社會長期累積的共識與公民教育。它不僅是對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傳統美德的現代演繹，更反映了香港人對公共空間互相尊重的重視。

當然，這股可喜的風氣也需要社會各方的共同滋養。從政府的宣傳，學校的教育，到家庭的言傳身教，都在默默鞏固這份價值。香港關愛讓座之風，為這個亞洲國際大都會增添了一份難以取代的人情味。這份溫暖，值得我們珍惜、傳遞，並引以為傲。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鎮江這趟行程，天氣是真熱，揮汗如雨，可一頭扎進鎮江的真山真水，卻在汗水蒸騰中生出一種酣暢——彷彿這盛夏的熱，就該用這樣的山水來消受。

這一趟，全賴朋友鍾博士盛情又周到的安排。到鎮江已近傍晚，鍾博士接上我們往西津渡去。「先看夜景，」他說，「涼快些。」西津渡位於鎮江城西雲台山麓，依山臨江，三國時稱「蒜山渡」，唐代叫「金陵渡」，宋代以後才叫西津渡。古時渡口緊鄰長江，後來江灘淤漲、江岸北移，古渡如今已遠離江岸數百米。

踏着青石板拾級而上，路面中央留着深深的車轍印——那是千百年獨輪車碾出來的溝痕，光滑得像被江水洗過。兩旁老屋依山而建，馬頭牆、雕花門樓、木格窗櫺，明清的格局裏偶爾夾着一兩幢維多利亞紅磚建築，那是當年英國領事館的舊址，如今已作鎮江博物館。走到高處，元代的昭關石塔靜靜立在街心，暮色中，塔影溫潤。回身望去，萬家燈火綿延鋪展。朋友小沙和講解員都說，她們小時候就住這片老屋，每天踩着青石板上學。

西津渡有一處考古探方，坑內錯落排列着不同時期的道路基底：清代的是不規則石塊，明代是灰磚，宋元時期和唐代是夯土層，最底層是古人鑿出的原始棧道。時光在腳下，如一方「提拉米蘇」，一層風雅，一層滄桑，層層疊疊，竟已積澱了千年。

唐朝張祜曾寫：「金陵津渡小山樓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裏，兩三星火是瓜洲。」遠處，長江如帶，當年的潮落月斜、兩三星火，如今是重重街燈和人聲。

次日一早去焦山。焦山聳峙於江心，坐船幾分鐘。山上林木蒼翠，遠看像浮在江中的一塊碧玉。定慧寺、碑林、古炮台隱於山中。京口素有「金山寺裏山，焦山山裏寺」之說。乾隆下江南，比過金焦二山，認為

挖掘出光芒。故事圍繞草根峨眉女足征戰「至尊無敵杯」展開。這支隊伍由一群不得志的大齡女性隊員組成。有的被渣男拋棄，有的是殘疾盲人，有的是孤兒，為了一個共同的足球愛好，她們走到了一起，有誤解，有分歧，有短暫的不合，最終將峨眉功夫融入足球招式，一路對抗資本操控、對手惡意打壓，放下勝負執念，依靠彼此扶持逆風突圍。

選擇女足作為敘事主題，竊以為是十分巧妙的選擇。如果聚焦男足，很容易引發鋪天蓋地的負面爭議，大眾對男足的固有印象大概率會干擾到影片口碑。但女足本身，自帶堅韌、拼搏的正向底色，更適合傳遞小人

盛夏遊鎮江

「若以本色論山水，我意在此不在彼」——他更偏心清幽的焦山。

古炮台位於焦山東麓。八座炮位呈馬蹄形排列，旁邊還有彈藥庫和營牆。站在炮位往下看，江水湯湯，波平浪靜。炮台牆體被風雨侵蝕得斑斑駁駁。一八四二年七月，英軍進犯長江，副都統海齡率守軍依託炮台抵抗，千餘守軍全部陣亡。恩格斯在《英人對華的新遠征》（The New Chinese Expedition，載於一八五七年四月《紐約每日論壇報》）一文中，高度稱讚鎮江保衛戰：「英國人克服了這些困難，逼近鎮江城的時候，才充分認識到：駐防旗兵雖然不通兵法，可是決不缺乏勇敢和銳氣。這些駐防旗兵總共只有一千五百人，但卻殊死奮戰，直到最後一人……如果這些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，他們絕到不了南京。」

太陽明晃晃照着，伸手一摸，老炮管燙手。撫古追今，我幾乎落淚。

焦山碑林與西安、曲阜並稱全國三大碑



物追夢的理想，貼合大眾對女性力量的共情。

星爺一向擅長打造爆梗台詞，《功夫女足》也不例外。比如「踢球就是為了踢球」，褪去了功利執念，回歸熱愛本身。還有「Be water, my friends」，這本是李小龍的哲學思想，倡導人應像水一樣流動，不必拘泥於形式，影片中峨眉隊長也借用了這句話，體現了柔中帶剛的生存智慧。

星爺的作品，出彩的是天馬行空的想像力。《功夫女足》裏同樣欣賞到星爺令人嘆服的想像力。賽場上的美瞳戰術、盲人門將的獨特守門方式、輕功武學與足球技巧大膽融合，每個人物出場時的個人特質，都為後

林。北碑尚廟堂之氣，焦山獨攬江海逸韻，堪為「江南第一碑林」。《瘞鶴銘》殘石隱於雷轟岩，被譽為「大字之祖」。相傳為東晉王羲之所書，原刻於焦山崖壁之上，後崖石崩落入江，在水底沉了近千年，直到清康熙年間才打撈出水，殘石殘留九十餘字。蘇舜欽詩云「山陰不見換鶴經，京口今傳瘞鶴銘」，說的正是這樁事。陸游、米芾都在這兒留下過題刻。那些字刻進石頭裏，一千多年了，鋒棱還在。

金山寺始建於東晉，一千六百多年了。原本在江中，依山而建，後來泥沙淤積，與南岸相接，所以有「金山寺裏山」之說。王安石留筆：「數重樓牀層層石，四壁窗開面面風。忽見鳥飛平地上，始驚身在半空中。」站在寺下，一隻小鳥停在風鈴上，風鈴輕搖，錚錚如磬。

蘇軾亦與鎮江緣分頗深，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都曾留下他的履痕和詩詞近百首。站在此處，我忍不住想——一千年前的某個夏日，蘇軾是否也這樣立過？那時他或許剛從金山放船至焦山，看「焦山何有有修竹，採薪汲水僧兩三」，江風把他的袍角吹得微亂；或許正登妙高台，望大江東去，吟出「我家江水初發源，宦遊直送江入海」。

我此刻踩着的這塊地，其中某一層，或許還蘊着蘇軾的那點酒意與月光，笑說：山水有好友，便勝卻人間無數炎蒸？隔着一千年，我忽然覺得盛夏也可親。

鎮江飲食極美，「長江三鮮」刀魚、鮰魚、河豚都產在這兒。鍾博士帶我們去了一家館子，清蒸刀魚足有一尺長，其大其鮮，實屬罕見。鍋蓋麵也是鎮江特色。大鐵鍋裏漂着一個小木鍋蓋，麵在鍋蓋底下滾，湯頭濃郁，麵條筋道。

「何處望神州？滿眼風光北固樓。」剛剛走過的鎮江，山水蒼翠，煙火嫋嫋，和一千年前一樣，又不一樣。

◀江蘇鎮江西津渡。 作者供圖



如是我見
陸小鹿

當功夫遇見女足

年少時不懂周星馳（星爺）的好，只覺得他的無厘頭風格瘋癲癲癲。人到中年才恍然：能發自內心逗笑觀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這些年補看了不少他的作品，好幾部我都給了五顆星，《喜劇之王》《唐伯虎點秋香》《大話西遊之月光寶盒》《九品芝麻官》……我欠星爺的何止是一張電影票。所以，時隔七年他推出《功夫女足》，我就專程買票支持了。進得影院，有些意外，上座率不錯，近乎滿場，很久沒有看到這麼高的上座率了，大概不少人同我一樣，奔赴一場情懷之約。

本片延續星爺標誌性的「反套路」勵志敘事，用無厘頭來消解困難，在小人物身上